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五辑】

东游考察学校记

关赓麟 著 孔繁文 吴国聪 整理



海外集

凤凰出版社

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【第五辑】

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

东游考察学校记

关赓麟 著

孔繁文 吴国聪 整理

本辑执行主编 徐雁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游考察学校记 / 关赓麟著 ; 孔繁文, 吴国聪整理.
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8.6
(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. 第五辑)
ISBN 978-7-5506-2793-2

I. ①东… II. ①关… ②孔… ③吴… III. ①学校—
考察—日本—文集 IV. ①G649.313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25031号

书 名	东游考察学校记
著 者	关赓麟 著 孔繁文 吴国聪 整理
责 任 编 辑	樊 昕
装 帧 设 计	姜 嵩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 发行部电话 025-83223462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fhchs.com
照 排	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印 刷	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, 邮编: 226300
开 本	880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5.125
字 数	133千字
版 次	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06-2793-2
定 价	36.00元 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 电话: 0513-80237871)

存史鑑今

袁行霈題



袁行霈先生题辞

「音實難知，知實難逢，逢其知音，千載其一乎！」（《文心雕龍》）
知音——今讀新編稀見史料，
刊，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。

傅璇琮謹書

二〇一二年

傅璇琮先生題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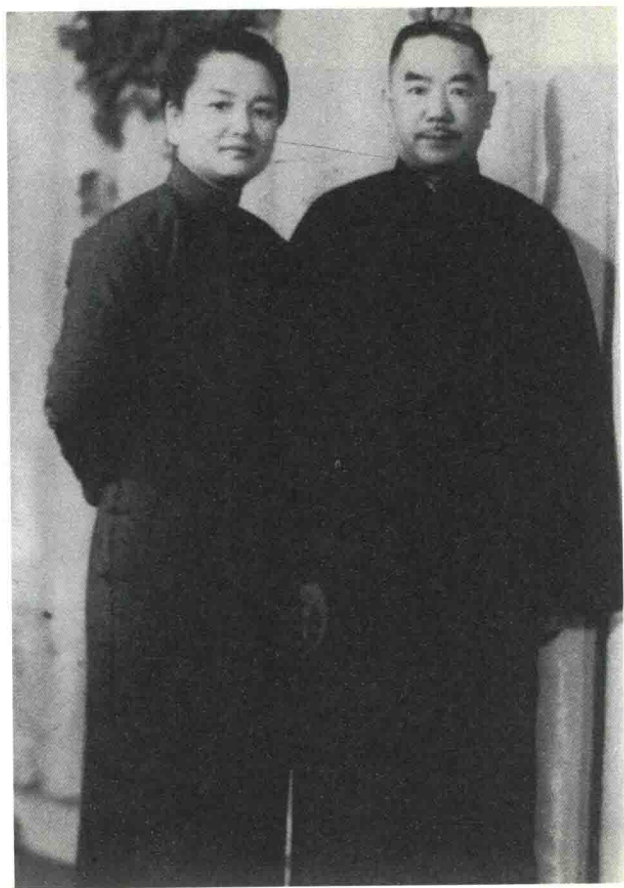
殫精竭慮旁搜遠紹
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
料庫

王水照
二〇一三年
一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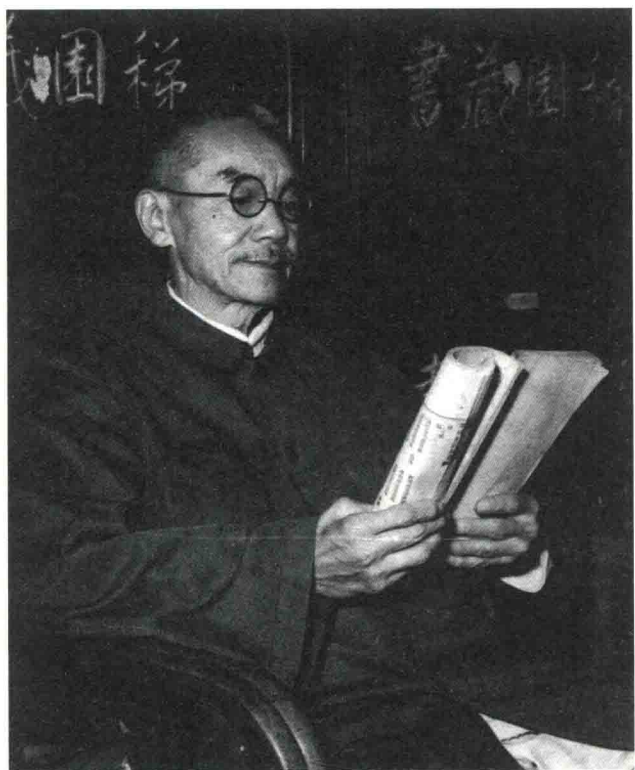
王水照先生題辭



青年时的关赓麟



关赓麟与夫人张祖铭



老年时的关赓麟



祖孙三代



1959年关赓麟生日合影

逐流飛渡赤龍驤
送陸辰事遠航
直以大江供洗
被不辭雲雨足
流觴衆壑似補
援聲咽山影交
連樹影長風昔
未殊今已昔逝
波如生送彭陽
景

孫宜先生雅屬

關廣麟



关廣麟书法

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总序

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，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“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”（罗素《中国问题》）。她绵延不绝、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？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：“和平、和谐、包容、开明、革新、开放，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。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，文明就繁荣发展，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，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。”（《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07年第1期）

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，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，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，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，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。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，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；更不用说遭逢“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”、“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”（李鸿章《筹议海防折》），“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”（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序》）的中国近现代。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，但是，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，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。1998年6月17日，美国三位前总统（布什、卡特、福特）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、前财政部长、前国防部长、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：“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。”（徐中约著《中国近代史》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，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）即便如此，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，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，相反，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。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

怎样呈现,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层面,人们还在不断探索。这个问题,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。但我们坚信,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,涅槃重生。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,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。

不过,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,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。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,内容复杂,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,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,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。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:“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,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。”那么,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,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——这是我们编纂这套《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》的初衷。

书名中的“近现代”,主要指 1840—1949 年这一时段,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,可以适当向前延展,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“近代中国”、“晚期中华帝国”又有所区分。将近现代连为一体,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,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,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,风从何处来;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,或为涟漪,或为浪涛。个人的生活记录,与大历史相比,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。变局中的个体,经历的可能是渐变。《丛刊》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,以个体陈述的方式,从生活、文化、风习、人情等多个层面,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。

书名中的“稀见”,只是相对而言。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,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,真身虽仍“稀见”,化身却成为“可见”。但是,高昂的定价、难辨的字迹、未经标点的文本,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。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

或数字化的文献,或流传较少,或未被整合,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。因此,《丛刊》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,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、断句费力、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,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,在我们看来,这些文献都可属于“稀见”。

书名中的“史料”,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,举凡日记、书信、奏牍、笔记、诗文集、诗话、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,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、思想、性情的文献,都在考虑之列。我们的目的,是想以切实的工作,促进处于秘藏、边缘、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,通过一辑、二辑、三辑……这样的累积性整理,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,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,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,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,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、日常与细节;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,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;甚至在主流中,还有漩涡,在边缘,还有静止之水。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、大痛苦的时代,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、所思所想的起落,藉纸墨得以留存,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。此中有文学、文化、生活;也时有动乱、战争、革命。我们整理史料,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,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。当然,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,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,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,减少因个人视角、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。

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,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。清人舒位诗云“名士十年无赖贼”(《金谷园故址》),我们警惕袖手空谈,傲慢指点江山;鲁迅先生诗云“我以我血荐轩辕”(《自题小像》),我们愿意埋头苦干,逐步趋近理想。我们没有奢望这套《丛刊》产生宏大的效果,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,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,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,适当“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”(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版序言)。

《丛刊》的编纂,得到了诸多前辈、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。袁行霈先生、傅璇琮先生、王水照先生题辞勛勉,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,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,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“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”重大规划项目,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……这些,都增添了我們做好这套《丛刊》的信心。必须一提的是,《丛刊》原拟主编四人(张剑、张晖、徐雁平、彭国忠),每位主编负责一辑,周而复始,滚动发展,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,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,令人抱恨终天,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。

《丛刊》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(鼓励必要的校释),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、更好地服务社会。希望我们的工作,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。

2013年4月15日

序

2017年7月初,孔繁文同志从家乡广东寄来先父关赓麟所著《东游考察学校记》的点校书稿一册,并嘱我为这本即将出版的书写一篇序。

我的祖籍是广东南海吉利乡(今属佛山市禅城区),可我却是1929年生于北京的,从小到大,说一口纯正的京音而不太识粤语,很自然以北京人自居。由于上学、工作都在北京,不大有机会去广州,偶尔去羊城开会,也是会后即返京,很少停留。有时也有顺路去老家看一看的愿望,但故乡显得太陌生了,既无亲朋,也无旧友,总是有些不知所往的感觉。一次在广州开完会,在粤籍同行何镜堂院士的热心陪同下,我去过一次南海,只是看了一下康有为故居,便匆匆北上了。

几年前,我有机会结识了热心的繁文同志。繁文是南海孔家的后人,秉承先辈热爱乡梓的精神,注意乡邦文献的搜集和南海地方文化的研究。他对我老家和先人都有一定的了解。每到北京,他都来寒舍探访,带给我一些先父的著述、书法作品的复印件,甚至赠我以父亲的手迹原件,对我来说当然弥足珍贵。有时繁文也陪同一些老乡来访,当地艺术家还赠送过我一些反映乡土特色的作品。多年的交往,使我和繁文同志成了亲密的朋友。他交给我的写序任务,虽有困难,我还是答应尽力来写了。

我在家中排行第十,是父亲最小的儿子。我出生那年,父亲49岁,正是他仕途、事业的鼎盛时期。

先父关赓麟,字颖人,出生于光绪六年(1880)。在祖父关蔚煌公(光绪二年丙子科举人,官大埔县教谕)的教导下,他成为一个在儒家